

【中国思想史】

中国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探析

董小龙

(西北政法学院, 陕西 西安 710063)

摘要:在对中国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全面分析的基础上,对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“义利观”给予重点剖析,并对儒家经济伦理的典型:徽商和现代儒商进行了分析。

关键词:儒家;经济伦理;徽商;现代儒商;义利观

中图分类号:F092.2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2731(2003)01-0045-04

一、中国儒家思想中的经济伦理成分

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历史上发挥了主导作用。面对影响人们最大的经济生活与经济行为,儒家有较为完善的经济伦理思想,它涉及经济活动的生产、分配、交换、消费各个方面,在规范层面上,既有理论层面的学说思想,也有实践层面、操作层面的政策、措施、人物典范。

就生产而言,在理论层面上,儒家提出仁者爱人、恪守礼制的思想学说。儒家一方面坚持“仓廩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则知荣辱”[1](《管子·牧民》),说明生产的意义,另一方面赞颂勤劳敬业的劳动态度,“制天命而用之”[1](《荀子·天论》),更关心生产者。孔子曾经说过,道千乘之国,敬事而信,节用而爱人,使民以时[1](《学而》)。即治国需注意三件事:办事谨慎以取信于民,节省费用以体现爱民,征力役不误农时以保护生产。

有人以孔子斥责弟子樊迟“学稼”为由,认为先秦儒家鄙夷、反对农业生产。其实孔子所表达的是社会生产分工思想,孔子并不反对生产,只是更重视礼制,礼义。这一点孟子说得更明白: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,治于人者食人,治人者食于人,天下之通义也。”[1]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即社会分劳心者、劳力者两大集团,其中前者是管理人,后者是被管理人,劳心者负责管理而不必从事生产,劳力者的职守就是从事生产劳动。

在实践层面上,儒家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,重本抑末,重农抑商。《盐铁论》说:“夫欲安民富国之道,在于反本,本立而道生。”强调农业是根本,要以农立国,并且限制工商业的发展,以免损害农业。重本抑末的政策主张最早是由先秦法家提出来的,法家在对其合理性论证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融进了道德成分,而先秦儒家并没有提出抑末的明确主张,但始终把重农放在富民的中心位置。由于先秦法家重本抑末符合儒家的礼义之说,它在汉代为儒家全面吸收继承就不足为奇了。

在操作层面上,儒家主张薄税赋。《大学》说:“是故财聚则民散,财散则民聚”,不蓄聚敛之臣,百姓就要遭殃,以薄税赋支持生产。其基本思想是爱民富民,当然它还包括使民以时,制民之产等。荀子说:“轻田野之税,平关市之征,省商贾之数,罕兴力役,无夺农时,如是则车富民。夫是之谓以政裕民。”[1](《荀子·富国》)孟子说:“是故明君制民之产,必使仰足以事父母,俯足以畜妻孥,乐岁终身饱,凶年免于死亡;然后驱而之善,故民之从之也轻。”

关于分配,在理论层面上,儒家倡导重义轻利说,构建了德一得相通模式。其目的则是要民维护、遵从、敬奉仁我之道。义利观是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内容。在分配问题上重义轻利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。孟子说“鱼我所欲也,熊掌亦我所欲也,二者不可得兼,舍鱼而取熊掌者也,生亦我所欲也,义亦我所欲也,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义者。生亦我所欲,所欲

收稿日期:2002-09-10

作者简介:董小龙(1960-),男,陕西咸阳人,西北政法学院副教授,从事理论经济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。

有甚至于生者，故不为苟得也。”[1]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

在实践层面上，儒家重视的是分配要有利于社会各等级阶层的利益均衡，即“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”[1]（《论语·季而》）由于当时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水平较低，基本生活需要尚未满足，因此有限的食物，相对的平均是必要的。

在操作层面上，儒家更重视的是安贫乐道的道德精神和清心寡欲的自律品质，以朴素宁静的田园式社会面对分配不公的现实。“死徒不出乡，乡田同井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则百姓亲睦”[1]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，提供了一种无功利的功利性、超功利的功利性的生活逻辑。

关于交换，在理论层面上，儒家提出诚信价值观。孟子说：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诚者，人之道也。”[1]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在儒家经典著作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里都竭力肯定诚的价值。而对“信”，“子贡问政，子曰：‘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’子贡曰：‘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’曰：‘去兵。’子贡曰：‘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’曰：‘去食。’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[1]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可见信的重要性。

在实践层面上，儒家讲求礼义，和为贵。在商业交换中，不要因为竞争而伤了和气。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[1]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，“争之则矣，让之则止”[1]（《荀子·儒效》），旨在促使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由对立走向和谐，由纷乱走向均衡，由功利走向道德。

在操作层面上，儒家强调重公益而抑私利，重他利而抑利己，重名分而抑僭越，重礼让而抑侵争。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促使人们思考的主要不是“利的权利”而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

关于消费，在理论层面上，儒家有节欲与知足之说。孔子主张“欲而不贪”[1]（《论语·尧日》），“士志于道，未足与议也”[1]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。孟子认为，要仁义在身，荀子则“君子乐得其道，小人乐得其欲。以道制欲，则乐而不乱，以欲忘道，则惑而不乐”，强调知足，认为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

在实践层面上，儒家提倡从俭。儒家从社会稳定的角度，提出统治阶级和劳动者阶级满足于从俭，节制自己的欲望，只是这种俭不是俭到简陋失礼，低于自己所处的阶级，失去身份。

在操作层面上，儒家提出了从俭的道德标准。孔子主张，在个人的生活享受上，要尽力做到“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”，并树立颜回这一典范。“颜子当乱世，居于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饮；人不堪其忧，颜子不改其

乐，孔子贤之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

二、儒家义利观演变剖析

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核心问题。“义利观”在整体风格与理论价值上统领着生产、管理、分配、消费、交换、决策等方面的道德规范。偏离了义利也就偏离了儒家经济伦理的主体。综观儒家义利观的演变大体有五次较大的变化。孔子的义、利关系表述反映了他那个时期的最高水平。孔子重义轻利并非不言利，只是“子罕言利”。他明确肯定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，认为每个人都渴望生活富足，过得舒适。他说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”，“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”[1]（《里仁》）。他认为“邦无道，富且贵焉可耻，而有道，贫且贱焉”也是可耻的[1]（《泰伯》）。他主张君子应该有自己的利益，“学而优则仕”[1]（《里仁》），“学也，乐在其中矣”[1]（《卫灵公》），“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……”[1]（《中庸》第十七章）。孔子鼓励弟子们努力读书当官受禄，不仅求利，而且求名。他自己也想富起来，他说：“富而可示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；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”[1]（《述而》）。诚然，孔子追求个人利益是有原则的，这个原则就是要符合“义”。符合义就取，否则，就不取。

孔子罕言个人利益，但常讲民众利益与国家利益。《孔子家语》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：“哀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‘政之急者，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’。公曰：‘为之奈何？’孔子曰：‘省力役，薄赋敛，则民富矣。敦礼教，远罪疾，则民寿矣。’公曰：‘寡人欲行夫之子言，恐吾国贫矣。’孔子曰：‘《诗》云：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’”[1]（《孔子家语·贤君》），孔子视民为父母，把百姓的富足放在首位。孔子直到老矣，还在奔走四方，推销自己安人立人，天下人安居乐业的政治主张。

孟子则彻底地去掉“利”的位置，并将“利”置于“礼”、“仁”、“义”的对立面。孟子称颂仁为“天下之广居”，“礼”为“天下之正位”，“义”为“天下之大道”[1]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。孟子说：“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[1]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

到了董仲舒那里，他开始谴责利了。“利者，盗之本也”，“为利”、“谋利”是“忘义”、去理的根源，它必然破坏行义为善，因此，为了能义，不但要“制欲”、“防欲”，而且还应终日言不及利，以言利为羞耻。从而在“义利”说方面，排斥利的存在比孟子走得还远。

宋明理学更是视利为洪水猛兽，朱熹的“饮食

者,天理也,要求美味,人欲也。”[2](《朱子大全·与刘共父》)道德世界即是“革尽人欲”,“复尽天理”[2](《朱子全书》卷十二),连要求美味这样小小的欲望也要抑制。他认为,“为义”便是问圣贤之域,而为利“便是趋愚不肖之徒”[2](《朱子全书》卷五十七)。

儒家之所以由罕言利,而至言利羞耻,为利“愚不肖”,甚至动机上有谋利的欲望都不允许,对“利”如此恐怖,可能是由于当时的自然经济基础差,生产力水平低下,人口增多,物质匮乏。

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,新经济萌芽状态的出现,儒家队伍中出现了叛逆者。他们代表了新的经济因素与新的经济伦理观。李贽提出为私心正名,他说:“夫私者,人之心也。人必有私,而后其心乃见,若无私,则无心知。”[2](李贽《藏书·德业儒臣后论》)在李贽看来,人们的一切活动,就是以“私心”为动机和动力的。李贽不仅从人性普遍的角度肯定“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”[2](李贽《明灯道古录》卷上),而且从事实的角度认为圣人也离不开财势之用。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理学家所谓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圣人标准,从而把“圣人”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圣洁殿堂,拉回到不脱凡心的势利欲地,除去了加在“圣人”头上的中世纪的神圣灵光。李贽的义利观也有片面的地方,他的以利为义,从而鼓励人们任凭情欲放纵妄行,最终对社会发展不利。

颜元则针对董仲舒的“正其道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,反其道而行之,提出“正其谊以谋其利,明其道而计其功”[2](颜元《四书正误》卷一)。他认为义中之利,君子所为,他说“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,也有荷网持钓而不计得鱼者乎。”他认为最大的功利是“富天下”、“强天下”、“安天下”。他的理想人格或理想人才是“利济苍生”的圣贤,而非悬空闲说的文墨之人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李贽、颜元不是儒家的叛逆者,而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与实践者。

三、儒商形象:中国经济伦理典型的精神分析

尽管对儒商定义目前尚存争议,但儒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,其成功实践人们已耳熟能详。

儒商形象早期有徽商为代表。

徽州帮形成于明中叶,衰落于晚清。他们在商界“称雄”三百余年。作为一个群体,徽商集中体现了儒商精神与形象。

徽商素有近儒、好儒、习儒的特点,并力求使经商行为在正宗儒学的光辉下获得价值的合理性。徽商在经营理念上坚持心诚待人,崇尚信义。“诚”与

“信”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是两个重要的伦理范畴,自觉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指南的徽商以质取胜,不欺不诈,视信誉为生命。

明清时期,食盐已由官府专卖商品而为官督商销形式,经营食盐极易获利,当时有些盐商为了牟取暴利,往往在盐里掺假,而徽州盐商则不与之同流合污,保持着“行盐”的质量。因而民众喜食由徽州盐商经营的“准盐”。在商品的价格上,徽商是童叟不欺,市不二价。清代婺源商人朱文炽在珠江经营茶叶贸易,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,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必注明“陈茶”二字,以示不欺[3]。

徽商在经营中一直坚持“以义为利,利缘义取”。在徽商看来,“义”与“利”并非截然对立的二端,在商业经营活动中,商人完全可以做到“义利双行”,徽商认为,钱好比是泉眼,用狡诈求财,则是自塞泉眼,断了财路,而吝惜用财,也是自竭其流,只要“因义用财”,“取之有道”,泉水就会流之不竭。

薄利生财,甘为廉贾是徽商的经营准则。这一准则既是对经营对象的尊重,也是对经营中商家与顾客关系的深刻理解。休宁人程长公嘉靖年间在溧水经商,当地有一个惯例,倘若春时贷钱给他人,秋时可倍收子钱。但程长公放债时,仍旧“终岁不过什一”,只取薄利。所以,溧水百姓都乐意与这位从徽州来的坚持薄利经营的商人打交道,程长公也因此积累了数万金的资本。

徽商不仅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经营理念,而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,有着较好的个人道德。徽商“贾而好儒”,捐资兴学蔚然成风,许多徽商事业有成,家境稍裕后,则在家乡设立义学,捐资于书院。徽商对徽州的最大的书院“紫阳书院”先后捐银达2.26万两。当然,徽商中也不乏有一些奸巧欺诈之徒,但它不代表徽商“义利双行”的主流。

现代儒商形象不妨以田家炳、张瑞敏为例。

田家炳,香港著名实业家、慈善家,主要经营塑胶薄膜、人造革和房地产等产业。1974年,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885号小行星命名为“田家炳星”,肯定他多年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,特别是教育事业的业绩。田家炳早年家贫,离乡出外打工创业,以勤劳与智慧创下家业。在这期间即表现出他的仁厚、善良及对社会的关注。1958年,他从印度尼西亚举家迁往香港,在香港屯门买下了十分荒凉的海滩地,填海造地,选择塑胶和人造革行业,兴办实业。当时有人讥笑他“把钱往海里扔”,而他说:“经商不是完全为了赚钱,应该有更理想。”[4]田家炳在经营中一

直坚持“正派经营”的原则，以诚信见长，以真情取胜。他说：“诚信最重要，我们生意做得并不大，但是与我们来往的客户都知道，我们说话算数，与田氏来往，绝对不会吃亏。”

田家炳创下家业后，与古代儒商一样造福桑梓，回报社会。他在家乡广东大埔县兴建了湖寮大桥、明德大桥、党溪大桥、玉湖大桥、蕪桥、延东桥、大厝电视差转台、银滩水电站。田家炳热衷于教育事业，其教育捐资遍及华夏，迄今他的捐助总额已逾数亿元。早在1982年，田先生就预立遗嘱，要将总资产的80%转移到基金会名下，以实现他的“独乐不如众乐，留财于子孙不如积德于子孙”的人生信条。

张瑞敏，最常听到的称谓是“儒商”，或者准确地说是现代儒商。1999年12月7日，英国《金融时报》公布了“全球30位最受尊重的企业家”排名，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名列第26位。这是目前中国企业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最有影响力的美誉。

张瑞敏具有现代儒商自信、淡泊、和蔼、聪敏、好学的人格品质，也有在市场行为上坚持诚信、义利双行的商业道德，同时具有基于社会责任感的以产业报国为理念的强烈创新精神。

1985年，张瑞敏刚到海尔（时称青岛电冰箱总厂），有一位朋友要买一台冰箱，结果挑了很多台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，最后勉强拉走一台，张瑞敏检查了一下库房，发现有76台不合格产品，张瑞敏集合全体职工到车间，问大家怎么办？多数职工说折价处理给职工算了，当时一台冰箱的价格800多元，相

当于一名职工一年的收入。张瑞敏说：“我要是允许把这76台冰箱卖了，就等于允许你们明天再生产760台这样的冰箱。”他宣布全部砸烂这些冰箱，谁干的谁砸，并抡起大锤砸了第一锤。

为了对消费者负责，海尔通过了各种质量保证体系。1992年，海尔的冰箱、冰柜、空调、洗衣机四个企业获得了ISO9001质量认证。不久海尔通过美国UF认证，德国VDE、GS认证，加拿大CSA认证，澳大利亚SAA认证，欧洲CE认证；取得向上述国家出口出口资格。1996年6月，海尔获得EN45001质量监测认证；1996年8月，海尔电冰箱系统成为国内企业第一家通过IST14001环境体系认证的企业，成为中国惟一通过质保+环保的双保企业。

从海尔早期的“真诚到永远”的承诺，到现在的海尔国际服务理念，海尔的“产品零缺陷，使用零抱怨，服务零烦恼”目标，海尔的服务宗旨：“用户永远是对的”，为海尔打造了“取之有道”的诚信品牌，从而赢得国内外消费者的高度信赖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许嘉璐. 文白对照十三经[M]. 广州：广东教育出版社等，1995.
- [2] 四库全书[M]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1934.
- [3] 周晓光，李琳琦. 徽商与经营文化[M]. 北京：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，1999.
- [4] 朱平. 仁者、智者、强者——田家炳：新时代的人格典范[J]. 道德与文明，2002，(3).

[责任编辑 卫玲]

On Confucian Economic Ethic Thoughts in China

DONG Xiao-long

(Northwest Politics and Law University, Xi'an 710061, China)

Abstract: Based on the complete analysis on China's Confucian economic ethic thoughts, this article gives not only a focal analysis on the pointview of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, which is the core idea of Confucian economic ethic thoughts, but also gives a psychic analysis of An Hui merchants, who are the typical ones of Confucian economic ethics, and modern Confucian merchants.

Key words: Confucian; economic ethic; An Hui merchant; modern Confucian merchant; pointview of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; sincerity; analysis